

# 憶沙坪壩

黎東方

抗戰的第二年年尾或第三年年頭，我從成都到了重慶，在教育部下「聘任的委員」，擔任史地教育委員會的工作。不久，羅家倫校長邀我到中央大學作歷史系的主任。我向他說，張貴永兄比我適當。他說：「你正是他所推薦。他認為你比他適當。」結果，張不肯繼續做這個系主任，我亦無法身兼這個系主任，系主任便由金毓黻先生做了。羅校長要我至少作中大的專任教授。當時勸我辭掉教育部的事，說那是官場的玩意兒，五日京兆，回到學校裏的崗位來，才是「長事」。我向余井塘先生請教，余先生說，你才來不久，這史地教育委員會差不多是因為你答應來才設，怎麼可以「就走」？我告訴羅校長，羅說：「你可以兼我們的專任教授。」我又問井塘，井塘說：「兩個專任不好，以我的經驗而論，同時做兩件事，不可能都做好。」於是我專心做教育部的事，而中大的事改為業餘的兼任。不料却一直兼到了抗戰即將結束，顧孟餘接任中央大學校長，董冠賢代他辦事之時。每兩個星期，我去沙坪壩一次，於兩天之內把兩個星期的兼任鐘點教完。（每個星期六小時，兩個星期是十二小時，在一個下午，一個晚上，與一個早上教完，够苦。）陪我吃這個苦的，是傅抱石。他住在金剛坡的山脚，每隔一個星期的星期四晚上，等候我從青木關步行若干里而來，招待我吃晚飯，談到就寢之時。次日清晨，兩人於再度飽餐了一頓傅太太的佳肴以後，並肩爬山，邊爬邊聊，爬了一千多級而不覺累。爬到山頂，有涼亭供我們二人休息。休息以後走一大段小高原的平地，然後下坡，在正午左右到達沙坪壩，我的全程是四十五里左右，抱石的全程是二十里左右。我們二人常到松鶴樓吃一碗腰花麵。有時候遇到繆鳳林，坐到他的桌子旁邊。或是他後到，便邀他來到我們的桌子之旁。吃了麵，便趕到建築在借自重慶大學的地皮上的校舍，分別到各人的教室裏去上課。上到晚餐之時，吃了晚餐又上課。第一年，當天晚上，抱石睡在另一間，而我睡在沈剛伯先生與方東美先生合用的寢室。沈先生回去了湖北的三斗坪。沈先生回校以後的幾年，我住在那一個寢室，今天怎麼也記不起了。

星期六上午，再上課；下午，我又與抱石爬山，爬到山頂，下坡，到金剛坡山脚他的家，再享受傅太太的佳肴一次。星期天的早上，我步行回青木關。為什麼步行、步行？不坐長途公共汽車？因為，花了車費，那兼任的薪水便所得無幾。

這樣匆匆來去，實在對不起選我的學生。當時我常在三十邊上，自問也並無任何了不起的心得足以對他們有所啓蒙。當時，選我課的人甚多，其後卓然自成一家者不少，然而他們皆得力於中大歷史學系其他幾位權威學者的傳授，與自己的潛修。其中，今日聲譽最著者為曾祥和、王聿均、李毓澍、唐德剛、劉子健五位教授。曾教授當時已是研究生，不屬於歷史學系，只是特意捧場，來我的班上旁聽而已。另一位捧場旁聽者是周軾賢助教。沙坪壩有重慶大學的堅固磚屋，也有中央大學的克難建築。克難建築的窗戶照例沒有玻璃，而只有遇風即破，遇雨即濕的紙。同學們的飯廳，也似乎是有桌無凳，大家站着吃。所吃的八分是米，二分是稗子；蔬菜不多，葷菜極少。

然而，大家的精神都是很奮發。直至抗戰結束，沒有人發出怨言，沒有人鼓動作反餓餓示威，或參加反餓餓示威。中大師生最引為自豪的是圖書儀器從南京搬來，一件不少。農場的牛也隨了管理員越山涉水而來，一頭不少，並且多出了幾個小牛。大家因此都愛戴羅校長，欽佩那一位姓名已佚的農場管理員。以上，只是我關於沙坪壩的片斷的回憶。

七五、一二、一四寫於病中